

邮师文缘,说得详尽一点,就是我在高邮师范学校所遇到的文学机缘。这个机缘在这里特指两个人:一位是文学前辈莫绍裘先生,笔名叶榭,国内知名作家、诗评家。还有一位就是此文我要重点讲一下的费振钟先生,也是国内知名作家,很有建树的文化学者。这两个人年龄前者比我大,后者比我小,我夹在中间,在业余写作上蒙他们上拉下托,今日回想起来,竟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文福的人,幸运至极。

费先生是在我之前进入高邮师范的。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,脾气又都比较耿直,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。费先生平时话不多,总是埋头做自己的事。对于一些看不顺眼的人和事,他改变不了,但会抵制,用他自己的方式抵制。学校里有一位教导主任,为显权威,常常事先不通知老师,突然袭击式地跑到老师的课堂上去听课。有一次这位主任坐到了费先生的课堂后面,费先生也不说什么,只是让学生先看二十分钟课文。主任走也不是,不走也不是,只好在后面坐冷板凳。二十分钟过去了,主任打开听课笔记准备认真记录,不料费先生又让学生再看二十五分钟书,让主任继续在后面坐冷板凳。这件事后来在学生中几乎成为笑谈。有的学生毕业后成为学校领导,都以此为戒,不敢不跟老师打招呼就贸然闯到老师的课堂上去。除了这幽默的一面,费先生还有豪气干云的一面。他是兴化人,兴化是《水浒》的诞生地,《水浒》里的英雄能喝酒,费先生的酒量也不差。一次学校年终聚餐,一位领导自恃酒量大,以酒王自居,说学校里没有他喝酒的对手。费先生和语文组的另一位也是能豪饮的申建华君听到后,拿起三只空碗走到他面前,分别哗哗斟满酒,请那位领导和他们一同干了,露一露英雄本色。不料领导拱手求饶,甘拜下风。费先生和申建华君各自端起一碗酒,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,笑吟吟离去。那位领导目瞪口呆,从此喝酒再也不敢称霸称雄,老老实实做酒桶一个。

费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很随和的人,他在语文组里和大家关系都处得很好。后来我有幸和他成了斜对门的邻居(都住在校园的平房里),更是经常见面,有时烧饭之余还会站到院子里聊几句。聊南石桥的盐水鹅味道好,聊跟毛豆米烧的小小鸡不能超过多重,聊要到哪里去买泡菜坛子。当然,也会聊一聊文坛上新出的好小说。当时在学校里有两件事很让我享受。一是和莫先生费先生聊天,

邮 师 文 缘

□ 吴毓生

从人情世故聊到作家作品,能在不经意间学到很多东西。二是午饭后和费先生一起到学校浴室洗澡,偌大的浴池里,没有几个人,我们从容洗完,避免了与学生坦诚相见的尴尬,心里直接偷着乐。——这样自由自在充满亲和力的日子,能在种好教学大田的同时,还能经营一小块文学自留地,能不偷着乐吗!

可惜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。费先生很快因为文学评论成果斐然,而调到南京《雨花》编辑部,莫先生也几乎同时被扬州师院中文系挖去。一下子失去两个同道人,我真怀疑我还能不能在业余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。但他们仍心中有我,人走茶不凉。莫先生到扬州后,竟然用他写诗评的手,热心为我在《扬州文学》上的小说写评论。费先生到《雨花》后,要我不妨也写点评论。我当然有杆子就爬,看到《雨花》刚发了一部中篇小说,就写了一篇四千字的评论送过去,费先生很快就发出来了。后来,费先生要我有小说也可送给他。我自然还是顺杆爬,正好手中有——一篇刚写好的《轻松》,只有三千多字,我觉得太少了,又一鼓作气写了另外两篇《轻松》,凑成三题寄给他,足有一万字。我满心期待,哪知最后发出来的却是第三题凑数之作。费先生向我表示遗憾,说他做不了主,却不知道给我留下了一个天大的机缘。我将未用的两题《轻松》重新打包,经朋友推荐,寄给了山西太原的《城市文学》,《城市文学》很快就用出来了。只是刊误较多,我反倒有点闷闷不乐,不敢拿出来示人。哪知不久,《城市文学》的主编孙涛先生给我寄来一信,说将我的小说推荐给《小说选刊》,《小说选刊》已决定留用第一篇《轻松》,让我尽快发一个个人简介过去。我顿时呆住了!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?这不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馅饼吗!《小说选刊》从创刊起我就开始订阅,一直认真阅读,它莫不是被我的忠诚感动了?激动之下,我立即到邮局用电报将我的简介交给了《小说选刊》。但在办公室里,我不敢透露半点口风,生怕情况有变,沦为笑柄。三个月后,我终于拿到了刊有《轻松》的《小说选刊》。我高兴,又高兴不起来,因为《小说选刊》把《城市

文学》的刊误原封不动地搬了过去。我依然不想拿出来示人,只是自己一个人欢喜一阵,就把这一页翻过去了。而且,我也没有就此大写小说。我觉得我的小说写作还卡在一个瓶颈上,写不好不如不写。相反,我这时开始写起散文,而且写得很顺手,热情的费先生就给我在《雨花》上发了两篇。山西太原好像是我的福地,继《名作欣赏》《城市文学》发表我的评论、小说后,省刊《火花》也发出了我的散文,让我至今都对太原怀有感激之情。但这时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,又一个天大的惊喜落到了我的身上:毫无任何征兆,我的一篇发在《散文百家》上的《风景》,竟被《读者》选载了。我心里那个乐呵!《小说选刊》《读者》这样的名刊都被我撞上了,我何其幸也!

但我的幸运并没有到此而止。随着高邮师范汇入高校,想要得到正高级职称必须要有专著,我又开始专心于文学评论。莫先生调扬州前已为我在《名作欣赏》铺好路,我依然一篇一篇认真地写。费先生则把我的一篇关于黄蓓佳的小说评论,推送到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上。后来费先生从《雨花》调到省作协创研室,主编一本名叫《评论》的书刊,更给了我莫大的机会。我立即对省内作家苏童、叶兆言、黄蓓佳、赵本夫的小说一一研读并评论,且全都刊出。这时我在《名作欣赏》发了一篇刘庆邦短篇小说《响器》的赏析,觉得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可以探讨一下,就写了一篇一万二千字的专论《农村女性的情感世界》送给费先生,费先生立即慷慨发出。但遗憾的是,具体操作人员在发排时,不小心弄丢了三千字。我很心痛,费先生也很无奈。但万万想不到的是,这又一次的遗憾,又给我带来了一个不可多得机缘。我遗憾之后,把文章直接寄给了刘庆邦,说明情况,想借他的声望,推荐到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再发一次。哪知刘庆邦很快回信过来,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,正想找人配个评论,现在正好就把我的这篇评论附在后面。我大喜过望。刘庆邦是谁?他可是当前文坛上的短篇小说之王,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,都是首屈一指的。把我的评论附在他的小说后

面,真是太抬举我了。于是几个月后,我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样书,《胡辣汤》,刘庆邦著,系“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”之一,后面果然附着我的评论。捧着满含油墨香的新书,我再一次信了天上会掉馅饼的事儿,再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有文福的人。

然而我和刘庆邦的缘分到此还没结束。由于不断地写小说评论,对小说有了新的理解,我忽然觉得我可以写写小说了,就又断断续续写起来。效果也不错,都能发出来。其中有一篇八千字的《开会》,写好后我自觉可以,直接寄给了《雨花》编辑部。原想是碰碰运气,不料主编姜珞敏先生很快回信,留用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,几个月后刊物出来,还是发了个头条。本以为此稿到此画上句号,不想此时已任《中华文学选刊》主编的王干先生回高邮,看到此稿立即决定选用。我当时都没见到他人,而是他托人捎信给我的。这对我来说,无疑又是一次天大的惊喜。惊喜一下也就罢了,哪知惊喜后面还有惊喜。《中华文学选刊》拿到手,这期短篇小说共选了三篇,刘庆邦的《后事》也赫然在目。我惊讶之余,心中直喊缘分呵缘分呵! 和这样的名作家同台演出一次,即使是跑龙套,我也心满意足了。

我这一辈子,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文缘文福的人。此处不妨再说一件事,我刚进高邮师范时,在《青年文学》发表的两万字小说《轨迹与位移》,其责任编辑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古玩收藏家马未都先生。有这些文缘文福,在业余写作的道路上,我本应该走得远一些,可由于种种变故,我还是放下了笔。我勤奋不起来。或许从一开始,我就只是把写作当成一个乐子,写几篇文章留个念想,注定成不了气候。但我这儿仍然由衷感谢莫先生和费先生,感谢他们的热心扶持,感谢他们的竭力相助。也感谢王干先生,他也是高邮师范人,感谢他在《中华文学选刊》对我的鼎力一拉。

前些时高邮师范人在珠湖小镇跨届聚会,我有幸又见到了莫先生和费先生。莫先生白发苍苍,和蔼慈祥;费先生美髯飘飘,笑意荡漾。费先生还特地给我带来了他的修订版新书《江南士风和江苏作家》。此书的初版我在三十年前读过,此刻我轻抚封面,想到在重温此书的同时,还能重温那些年一起闲聊逛街喝酒洗澡的年轻时光,不觉心头一热,泪水瞬间溢满眼眶——

无事不相忘,有事就帮忙。人生一世,这样的朋友能遇到几个呢?

汪曾祺读杂书

□ 刘琪瑞

汪曾祺先生博学多识,情趣广泛,爱好书画,乐谈医道,这与他痴迷读书尤爱读杂书,有很大关系。汪曾祺在《谈读杂书》一文中说:“我读书很杂,毫无系统,也没有目的。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。觉得没意思,就丢开。”并在《开卷有益》文中主张:“看书看得杂一些,即不只看文学书,文学之外的书也都可以看看。”“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,或有志成为作家的青年,应该博览群书。”

汪曾祺从十一二岁的时候,就开始读杂七杂八的书。杂书的来源大概有三条途径:一是借老师的书。汪曾祺从小学到初中,教国文的老师都是高北溟,从高先生处借得《郑板桥全集》来读。也从另一位启蒙老师韦子廉处,读了几十篇桐城派的古文,如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、方苞的《左忠毅公逸事》。二是“一折八扣

书”。这种书盛行于1930年代,其售价按定价一折后再打八扣,如定价一元实售八分,非常廉价,中学生所买的大都是这种书。汪曾祺先后买过笔记小说《子不语》《夜雨秋灯录》《续齐谐》等,也有诗词类的,如李清照的《漱玉词》、朱淑真的《断肠词》、陆游的《剑南诗钞》等。三是旧书摊。这是他后来淘旧书、杂书的主要来源。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,汪曾祺虽然经济拮据,还是从文明街的几家旧书摊,买过工具书《辞源》等。他在上海私立致远中学教书时,于地摊上买过不少杂书,如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、汤显祖评本《董解元西厢记》。

汪曾祺称,他看杂书所用的时间,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。概括起来,主要有三类:一类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书籍,如《荆楚岁时记》《东京梦华

录》。其次是方志、游记、杂论,如唐代刘恂的《岭表录异》、宋代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。讲草木虫鱼的书他也爱看,如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,清代吴其濬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、陈淏子的《花镜》。此外,他也爱读书论、画论。三类是无法归类的书,如北宋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、南宋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、宋慈的《宋提刑洗冤集录》等。

汪曾祺曾谈到读杂书的体会,他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:第一,读杂书是一种很好的休息。他认为,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,看杂书一册,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。第二,可以增长知识,认识世界。比如,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蝉原来是聋子,从吴其濬的书知道古诗里的“葵”即是苋菜。第三,可以学习语言。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,比较自然,不是正襟危坐,刻意为文,但自有情致,而且接近口语。第四,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、写散文的道理,尤其是书论和画论。小说、散文的各部分,应该“情意真挚,痛痒相关”,这样才能做到“形散而神不散”。

鹿鸣夏日

□ 王如祥

进门第一眼,是两尊麋鹿铜像,身姿挺拔,像刚从林间奔来,刹那定格。不远处,鹿王始祖卧姿沉稳,静默守望。我停在它面前,忽然觉得,它不是雕塑,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,替我守护了这个心愿许多年。

最动人的,总在深处。一号码头上车,观光车缓缓驶入散养区。刚转过一片芦苇,一只小麋鹿便蹦到路中央,歪着头看我们,眼神清亮,像在说:“你终于来

了。”随即,鹿群闻声聚来,跟着车子小跑,鼻息温热,唇瓣柔软,胡萝卜递出去的一瞬,那轻轻一啄,仿佛啄开了我心底封存多年的温柔。

湿地深处,鹿群自在如风。有的在泥滩踱步,蹄印深深浅浅;有的卧在水边,倒影随波轻晃;几头雄鹿迎面走来,鹿角高耸,泥痕满身,却丝毫不觉狼狈,反倒有一种不驯的野气——课本上那几行文字,哪里装得下这样的鲜活。

景区只有下午三点半一班车回大丰城区。身旁带着孩子的游客沈女士,听说我要回盐城市区,莞尔一笑:“我们自驾来的,顺路带你一程。”那一句轻描淡写的“顺路”,解了我一时的局促。

乡味川泓

□ 张存玉

运河绕城,邮驿传古,高邮这座浸润烟火与文脉的古城,藏着一处地道水乡风味去处——川泓酒店。凡高邮本地人,或是读过汪曾祺文字、寻味乡愁的来客,但凡想尝一口原汁原味的秦邮家常菜,多半会想到这里。

汪曾祺先生生于高邮,半生漂泊南北,写遍四方风味,心底最惦念的,永远是故土寻常饭菜。从前他回乡省亲,总要寻地道馆子,尝尝魂牵梦萦的湖鲜土菜。川泓酒店的主厨早年便有幸接待汪老,一道葱酱肉深得先生夸赞。闲谈间,汪老细数水乡吃食,聊虎头鲨余汤、咸菜慈姑汤、蒲包肉、红油鸭蛋,句句皆是乡情。后来店家依汪老笔下美食,创制汪氏家宴,把先生笔下的人间烟火,一一端上餐桌,川泓也成了承袭高邮老味道、接续汪老美食情怀的一方餐饮佳处。

这里所用皆是新鲜食材,湖河里捞上来的鱼虾、田园中新摘的时蔬、本地养殖户刚送来的麻鸭,样样鲜活实在。没有花哨猎奇的菜式,尽是土生土长的淮扬水乡滋味:奶白鲜醇的虎头鲨余汤,嫩得入口即化;软糯入味的葱酱肉,酱香浸透肉块;汪豆腐油润滑嫩,撒一把油渣提香;油条攪斩肉外酥里鲜,复刻汪老文中的趣味吃食;一碗咸菜慈姑汤清鲜回甘,藏着独属于高邮人的乡愁……

开店几十年,川泓酒店靠实在经营攒下满城好口碑。店内窗明几净,桌椅餐具时时擦拭,后厨规整清爽,处处干净卫生,让人吃得安心。定价公道实在,不欺本地人,不宰远来客,寻常百姓聚餐、亲友小酌,办家宴、待宾客,都愿意选在这里。店里服务更是暖心周到,待客谦和有礼,上菜及时,客人有任何需求,店家与店员都耐心回应,细致周全,从无敷衍怠慢。

一城文脉,一席乡味。汪曾祺用文字留住高邮美食,川泓酒店以灶台延续故土风情。人间至味从不在珍馐盛宴,而在这般新鲜实在、厚道暖心的寻常饭馆。

麋鹿,俗称“四不像”——脸似马非马,蹄似牛非牛,角似鹿非鹿,尾似驴非驴,我在生物课堂上讲过无数遍,却从未亲眼见过。六月末的一个清晨,我搭上从盐城驶往大丰的班车,赴一场迟了自己多年的约定。

不料刚到大丰城区,便错过游3公交,下一班竟要等到下午一点半。幸而遇见中华麋鹿园的工作人员姚师傅,他见我神色焦急,主动指点:“先坐109公交到川东小街,再打车过去,不绕。”换乘、等待、颠簸,30元车费换来最后一段13Km的乡间小路——当中华麋鹿园的大门终于出现在眼前时,一路的波折,化作了脚底轻快的风。